

中国城乡工人劳动权益的户籍差异研究

李晓飞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分割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长株潭城市群 2015 年的调查数据并采用相关的计量经济模型, 引入反映不可观测因素的代理变量, 考察了户籍制度的双重属性——户口性质与户口所在地对工人劳动权益的影响。结果表明, 剔除了代理变量的影响之后, 户口性质与户口所在地均对工人诸方面的劳动权益存在非常明显的影响。相对于城镇户口工人, 农村户口工人在劳动权益诸方面均处于劣势; 相对于本地城镇户口工人, 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在劳动权益诸方面同样处于不利地位。因此, 未来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但需要弥合由户口性质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 还需要弥合由户口所在地导致的“内外分割”。

关键词: 户籍差异; 劳动权益; 城镇户口工人; 农村户口工人; 内外分割

中图分类号: D63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6)06-0134-08

一、背景与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行政控制, 大量农村人口如潮水般涌入城市, 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 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然而, 尽管户籍制度放松了对人口流动的限制, 但其控制资源和利益分配的核心功能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于是, 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呈现出鲜明的城乡分割现象。由于不具有流入城市的户口, 农民工无法获得与本地城市工人同等的劳动权益。有学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1]近年来, 随着与市场化运动方向相反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勃兴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分割现象以及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 也成为许多研究者致力探讨的问题。

在早期的研究中, 城乡工人工资收入的户籍差异是大多数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问题。研究的基本结论认为, 城乡工人工资收入差异的绝大部分可以由户籍身份解释。孟昕等人基于上海市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 城乡工人的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而其中 50.82% 的差异是由于户籍歧视导致的。^[2]王美艳的一

项经验研究结果更为引人关注。她发现, 在城乡工人的工资差异中, 人力资本特征仅仅解释了差异的 24%, 而由户籍歧视引起的差异则高达 76%。^[3]近年来, 随着各地户籍新政的陆续出台,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呼声也日益强烈, 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户籍歧视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研究者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考察城乡工人工资收入的户籍差异, 他们开始关注在工资收入之外, 户籍身份对两类工人其他方面劳动权益的影响, 如两类工人的劳动时间差异^[4]、工会参与差异^[5]以及职业晋升差异等。^[6]

毋庸置疑, 已有研究较为客观地诠释了户籍身份的差异对城乡工人劳动权益的影响, 并提出了一些相关政策建议。然而, 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还存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首先, 已有研究只是基于户口性质即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 对城乡工人劳动权益的户籍差异情况进行对比, 忽视了户口所在地这一维度的影响, 而这种双重划分恰是户籍制度的特性所在。由于各地方政府有权出台本地区的户籍政策, 因此, 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对工人劳动权益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 其次, 已有研究将人力资本特征无法解释的差异皆归因于户籍歧视, 未免有失牵强, 因为这可能会忽略一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一方面, 两类工人的成长环境、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差别, 会对他们的职业发展产生影响, 而这些因素是无法观测的;

收稿日期: 2016-09-23; 修回日期: 2016-10-19

基金项目: 201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区域户籍制度改革的府际合作治理研究”(14CZZ020); 2013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府治理范式的变迁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联动关系研究”(13YJC810008)

作者简介: 李晓飞(1984-), 男, 安徽定远人, 管理学博士, 哲学博士后,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城市和区域治理

另一方面,尽管获得城市户籍的过程是高度选择性的,但一些个体仍然能够通过诸如招干招工、入学和参军等政策规定的途径成功实现“农转非”,获得流入城市的户口。这部分人便是通过“极度正向选择”筛选出来的精英中的精英。^[7]他们与其他流动人口相比,不但个体禀赋差异显著,而且还存在着较大的“能力”差别,而这种“能力”因素同样是无法观测的,而且也无法通过诸如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等可观测的变量予以控制。因此,将两类工人由于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劳动权益差异皆归因为户籍歧视,会因为遗失关键变量而导致有偏误的分析结果。

已有研究在上述两方面的未尽议题,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动机。本文将基于经验数据,运用相关的计量经济模型,评估城乡工人劳动权益的户籍差异。具体而言,本文力图回答以下问题:排除人力资本禀赋和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户口性质和户口所在地的差异会对城乡工人劳动权益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二、方法、变量与数据

(一) 研究策略

本文将采取两种策略来降低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第一,在城镇户口工人样本的筛选中,排除出生即为城镇户口的工人,只保留出生时为农村户口的工人,他们与农村户口工人共同构成了本文的研究样本。采用这一策略的目的在于,筛选出来的样本群体存在诸多相似的特征。他们均来自农村,不在城市中成长,同样会由于缺乏血缘和社会资本等因素导致职业发展的不利。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成长环境、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等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第二,引入两个代理变量(Proxy Variable)将“能力”因素提取出来,进而考察户籍身份对劳动权益的净影响。

(二) 模型设定

要考察两类工人劳动权益的户籍差异,需要将户籍的影响从其他自变量的影响中分离出来。一般而言,学界普遍采用的差异分解方法是布林德(Blinder)和奥斯卡(Oaxaca)于1973年创建的分解模型,即Blinder-Oaxaca模型。这一模型最初被用来研究工资获得的性别差异,其基本思想是将工资差异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模型中可以由性别特征解释的差异,二是无法以性别特征解释的差异,这部分差异即为性别歧视引起的差异。在当前的研究中,该模型被广泛地运用于解释两个群体之间在除了工资之外的其他领域中的差异。然而,该模型只能用于分解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时

的差异,无法用于分解当因变量为类别变量或二分虚拟变量时,基于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针对这一问题,尼尔森(Nielsen)对该模型进行了拓展,其思路也是将差异分解为可解释的部分和不可解释的部分,但它可以分解基于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运用的计量模型即是拓展后的Blinder-Oaxaca模型,该模型可以分解当因变量为类别变量或二分虚拟变量时,基于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8]以本文要研究的两类工人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为例,拓展后的Blinder-Oaxaca模型的函数方程如下:

$$\overline{C^u} - \overline{C^r} = \left[\sum_{i=1}^{N^u} \frac{F(X_i^u \hat{\beta}^u)}{N^u} - \sum_{i=1}^{N^r} \frac{F(X_i^r \hat{\beta}^u)}{N^r} \right] + \left[\sum_{i=1}^{N^r} \frac{F(X_i^r \hat{\beta}^u)}{N^r} - \sum_{i=1}^{N^r} \frac{F(X_i^r \hat{\beta}^r)}{N^r} \right]$$

其中:C表示作为虚拟变量的劳动合同签订,X表示一系列自变量, β 表示工会参与的Logit回归系数。方程右边第一项表示拓展后的模型可以解释的工会参与差异,第二项表示无法解释的差异。在剔除了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之后,这部分无法解释的劳动合同签订差异即可视为由于户籍身份的不同引起的差异。

(三) 变量选取

1. 自变量、控制变量和因变量

根据户口性质与户口所在地两方面的信息,本文的自变量有三个类别,即本地城镇户口、外地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控制变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映人力资本禀赋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非农工作经验年数四个变量;另一类是反映企业特征的变量,本文将之设置为企业所有制性质。就因变量而言,工资无疑是劳动权益最为核心的部分,它构成了本文的因变量之一。此外,根据已有的研究进展,本文重点考察已有研究较少涉及的两个方面的劳动权益,一是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二是社会保险的参与情况。

2. 代理变量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设置的代理变量为获得本地城镇户口的概率,即倾向性得分(P propensity Scores),在本文中定义为“在给定样本特征的情况下,非本地城镇户口工人获得本地城镇户口的概率”。为行文便利,本文将外地城镇户口工人获得本地城镇户口的倾向性得分简写为PS1,将农村户口工人获得本地城镇户口的倾向性得分简写为PS2。倾向性得分的函数方程如下:

$$f(x) = Pr[PS = 1/x] = E[PS/x]$$

其中: PS 代表指标函数。如果非本地城镇户口工人通过其“能力”获得了本地城镇户口, 则 $PS=1$, 否则, $PS=0$ 。倾向性得分通常无法直接观测, 在量化分析中需要借助 Probit 模型来估计。限于篇幅, 本文不给出 PS 的获得过程, 而是直接将其估计结果置入相应的模型中进行统计分析。

(四)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的数据来源于“区域户籍制度改革的府际合作治理研究”课题组于 2015 年 6 月~8 月组织的“长株潭城市群劳动力流动与劳动权益情况调查”。此次调查范围涉及长沙、株洲和湘潭 3 个地级市 13 个县(区), 采取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法, 四个阶段依次为县(区)、街道(镇)、企业和职工。其中, 对于企业和职工的抽样, 由调查员根据工商部门企业登记注册的情况采用等距抽样法抽取企业样本, 进入企业后采用随

机抽样表抽选职工进行问卷调查, 内容包括职工的个人情况、家庭背景、工作经历、目前的工作情况、企业改制以及与所在企业的劳动关系情况等内容。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 000 份, 回收问卷 2 653 份。其中, 剔除户口变量缺失的问卷 112 份, 共获得有效问卷 2 541 份, 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88.4%和 84.7%。根据研究策略, 采用列删方法对样本重新进行处理, 最终进入统计分析的样本总量为 2 308 人。其中, 本地城镇户口工人 459 人, 外地城镇户口工人 523 人, 农村户口工人 1 326 人, 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19.9%、22.7%和 57.4%。表 1 给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 1 的描述中可以得出以下基本观察。只有 3.9%的农村户口工人月收入超过 3 000 元, 比城镇户口工人低了近 25 个百分点, 15.8%的农村户口工人签订了劳动合同, 这一比例约为城镇户口工人的一半,

表 1 样本及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本地城镇户口(N=459)		外地城镇户口(N=523)		农村户口(N=1326)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32	72.3	219	41.9	873	65.8
	女	127	27.7	304	58.1	453	34.2
年龄	16~30 岁	72	15.7	185	35.4	463	35.0
	31~40 岁	211	46.0	226	43.2	666	50.2
	大于 40 岁	176	38.3	112	21.4	197	14.8
非农工作经验	5~10 年	56	12.2	116	22.2	593	44.7
	11~20 年	170	37.0	288	55.1	647	48.7
	多于 20 年	233	50.8	119	22.7	86	6.6
月工资	500~1000 元	63	13.7	124	23.7	395	29.8
	1 001~2 000 元	107	23.3	182	34.8	772	58.2
	2 001~3 000 元	116	25.3	121	23.1	108	8.1
	高于 3 000 元	173	37.7	96	18.4	51	3.9
劳动合同	已签订	394	85.8	236	45.1	210	15.8
	未签订	65	14.2	287	54.9	1116	84.2
企业所有制	非国有企业	131	28.5	386	73.8	1253	94.5
	国有企业	328	71.5	137	26.2	73	5.5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22	26.5	117	22.4	964	72.7
	高中(中专)	208	45.3	229	43.7	344	26.0
	大专及以上	129	28.2	178	34.0	85	6.4
社会保险	养老保险	373	81.3	337	64.4	511	38.5
	医疗保险	299	65.2	286	54.7	337	25.4
	失业保险	245	53.3	198	43.3	93	7.0
	工伤保险	107	22.3	61	11.6	34	2.6

注: 社会保险参与的统计结果给出的是每个户口类别的总体参保人数和参保率

而四类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则不足城镇户口工人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与本地城镇户口工人相比，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劳动权益中同样处于不利地位。此外，从表 1 中还可以发现，三类户口群体的人力资本禀赋也存在较大差异。超过一半的本地城镇户口工人的非农工作经验多于 20 年，近 30% 的城镇户口工人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而农村户口工人的相应比例只有 6% 左右。同时，有 70% 的本地城镇户口工人在国有企业工作，这一比例是外地城镇户口工人的 3 倍，是农村户口工人的近 15 倍。

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揭示出城乡工人的劳动权益存在较大的户籍差异。然而，仅有这些信息无法确定户籍身份的净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下面将引入代理变量并运用拓展后的 Blinder-Oaxaca 模型，将户籍身份对劳动权益的净影响分解出来。

三、计量分析

(一) 工资模型估计结果

以户籍身份为自变量，取月工资的自然对数为因变量，加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非农工作经验年数以及企业所有制性质为控制变量，构成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基准模型(模型 1)的结果显示，性别、非农工作经验、受教育程度以及企业所有制性质等人力资本和企业特征等控制变量均对收入有较为明显的影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企业所有制性质对收入的影响为负显著，表明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不及非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工人样本量相对偏少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劳动力的商品价值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体现。

我们重点观察户籍身份对工资收入的影响。模型 1 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变量和企业特征变量的情况下，农村户口工人和外地城镇户口工人的月收入水平，比作为参照组的本地城镇户口工人的月收入水平分别低了 37.3% 和 22.6%，并且回归结果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户籍身份特别是户口所在地的效应非常明显。然而，对城乡工人劳动权益户籍差异的考察还需要考虑到不可观测的“能力”因素的影响，否则将导致估计偏误。为了把不可观测的“能力”因素提取出来，使模型中剩下的残差与因变量无关，需要将 PS1 和 PS2 这两个代理变量加入模

表 2 工资差异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外地城镇户口	-0.226***	0.001	-0.187***	0.003
农村户口	-0.373***	0.003	-0.289***	0.005
年龄	-0.035	0.001	-0.041	0.003
年龄平方	-0.003	0.000	-0.004	0.001
性别	0.172**	0.014	0.183**	0.016
非农工作经验	0.041***	0.002	0.035***	0.004
非农工作经验平方	-0.005***	0.001	-0.004***	0.002
高中(中专)	0.082***	0.007	0.071***	0.011
大专及以上	0.117***	0.011	0.089***	0.013
企业所有制	-0.337***	0.016	-0.313***	0.021
代理变量 PS1			0.263***	0.034
代理变量 PS2			0.317***	0.048
常数项	0.426***	0.045	0.415***	0.047
样本数	2308		2308	
Adj.R ²	0.442		0.443	

注：在户籍变量中，“本地城镇户口”为参照组；在受教育程度变量中，“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故未显示结果。* $P<0.1$ ，** $P<0.05$ ，*** $P<0.01$

型进行统计分析(模型 2)。从回归结果来看，两个“能力”变量的确对城乡工人的月收入水平有明显的正效应。但是，即便提取了“能力”因素，在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户籍身份对月收入依然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农村户口工人和外地城镇户口工人的月收入，相对于本地城镇户口工人分别低出 31.9% 和 18.7%，并且该系数依然维持在 1% 的置信水平上。这一统计结果表明，户籍身份对城乡工人工资水平的影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能力”间接地反映出来，但其本身对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和农村户口工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存在着较大的限制。因此，从政策意义上讲，废除户籍身份对外来人口的各种限制，将显著提高他们的收入。

(二) 劳动合同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劳动合同是一个二分虚拟变量，需要采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表 3 报告了模型的具体分析结果。

表 3 中的数据显示，与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的是，年龄、非农工作经验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工人劳动合同的签订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均不显著。其中，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影响相对而言更为明显。这表明，工人更有可能与

表3 劳动合同差异的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外地城镇户口	-0.175***	0.043	-0.098***	0.037
农村户口	-0.240***	0.062	-0.165***	0.054
年龄	0.047***	0.023	0.032***	0.021
年龄平方	-0.003***	0.001	-0.002***	0.000
性别	0.011	0.016	0.013	0.014
非农工作经验	0.235***	0.051	0.162***	0.055
非农工作经验平方	-0.002***	0.000	-0.001***	0.000
高中(中专)	0.065	0.032	0.050	0.027
大专及以上	0.034	0.014	0.026	0.016
企业所有制	0.283***	0.005	0.226***	0.003
代理变量 PS1			0.147***	0.010
代理变量 PS2			0.161***	0.005
常数项	0.043	0.007	-0.012	0.038
样本数	2308		2308	
Pseudo R ²	0.318		0.316	

注：在户籍变量中，“本地城镇户口”为参照组；在受教育程度变量中，“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故未显示结果。 $*P<0.1$ ， $**P<0.05$ ， $***P<0.01$

国有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劳动合同签订的可能性较小。

就户籍身份对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而言，模型 1 中的数据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与本地城镇户口工人相比，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和农村户口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分别低了 17.5% 和 24%，回归结果同样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在模型 2 加入了 PS1 和 PS2 这两个代理变量之后可以发现，尽管代理变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即便剔除了这种影响，本地城镇户口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仍然比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和农村户口工人高出 9.8% 和 16.5%，户籍系数也同样维持在 1% 的置信水平上。这一结果表明，户籍身份对外来人口劳动合同的签订具有负向影响。

(三) 社会保险模型估计结果

目前，依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我国初步确立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等五个险种的社会保险体系。有研究者考察了前三类社会保险参与中的户籍歧视，^[9]本文增加工伤保险这一类别，分析户籍因素对工人四类社会保险参与情况的影响，采用的是多元 Logit 回归模型，具体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提供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非农工作经验、受教育程度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工人四类社会保险的参与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过，就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来看，企业更有可能为接受过大专以上学历教育的工人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就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影响而言，有研究认为，非国有企业工人更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养老保险待遇。^[10]本文的估计结果与这一结论有所不同，国有企业工人参与社会保险的概率要高于非国有企业工人，这与之前分析的劳动合同签订的情况相吻合。我们在对企业的调查中，发现国有企业与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明确规定了企业有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的义务，而大多数非国有企业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即便是为数不多的签订了劳动合同的非国有企业，在合同中也很少有社会保险方面的条款。

就户籍身份的影响来看，模型 1 中的数据反映出三类户籍群体工人在社会保险参与中的明显差别。相对于作为参照组的本地城镇户口工人，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在四类社会保险参与上的概率分别低了 23.2%、26.4%、30.3% 和 18.2%，而农村户口工人与之相比悬殊更为明显，分别低出 34%、32.5%、41.2% 和 43.7%，并且上述回归系数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从模型 2 中的数据中可以看出，两个代理变量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即便剔除了代理变量的影响，差别仍然较大。本地城镇户口工人参与四类社会保险的概率，比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平均提高了约 20 个百分点，比农村户口工人平均高出近 30 个百分点，并且也都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户口所在地对工人参与社会保险具有较为明显的限制作用，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和农村户口工人在社会保险参与中处于劣势。

(四) 城乡工人劳动权益户籍差异分解

基于以上对城乡工人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可以运用拓展后的 Blinder-Oaxaca 模型，将户籍身份对两类工人劳动权益的净影响分解出来。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两个组别：一组是城镇户口工人与农村户口工人(农民工)，用以分解户口性质的影响；另一组是本地城镇户口工人与外地城镇户口工人，用以分解户口所在地的影响。同时，纳入分解模型的变量与上述回归模型的变量保持一致。具体分解结果如表 5 和表 6 所示。

1. 户口性质对工人劳动权益的净影响

从表 5 的分解结果中可以发现，农民工在劳动权益的诸方面均受到较为明显的户籍歧视。首先，在工资收入方面，城乡工人的总差异为 41.3%。其中，人力资本和企业特征变量可以解释约 72% 的差异，而户

表 4 社会保险差异的多元 Logit 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养 老	医 疗	失 业	工 伤	养 老	医 疗	失 业	工 伤
外地城 镇户口	-0.232*** (0.014)	-0.264*** (0.012)	-0.303*** (0.011)	-0.182*** (0.011)	-0.211*** (0.010)	-0.237*** (0.011)	-0.255*** (0.010)	-0.146*** (0.011)
农村 户口	-0.340*** (0.015)	-0.325*** (0.011)	-0.412*** (0.013)	-0.437*** (0.012)	-0.274*** (0.011)	-0.243*** (0.010)	-0.367*** (0.010)	-0.371*** (0.010)
年龄	0.064 (0.025)	0.020** (0.027)	0.041 (0.024)	0.065 (0.022)	0.055 (0.015)	0.012** (0.013)	0.017 (0.015)	0.033 (0.015)
年龄平方	-0.002 (0.001)	-0.001** (0.000)	-0.003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0.001)
性别	0.043 (0.031)	0.051 (0.041)	0.044 (0.038)	0.039 (0.033)	0.032 (0.038)	0.041 (0.030)	0.033 (0.028)	0.026 (0.031)
非农工作 经验	0.017** (0.011)	0.014** (0.012)	0.016** (0.011)	0.015** (0.011)	0.014** (0.011)	0.011** (0.010)	0.010** (0.011)	0.012** (0.010)
非农工作经 验平方	0.001*** (0.001)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高中 (中专)	0.045 (0.015)	0.036 (0.018)	0.032 (0.017)	0.048 (0.014)	0.031 (0.012)	0.028 (0.013)	0.023 (0.016)	0.036 (0.013)
大专及 以上	0.223*** (0.028)	0.287*** (0.024)	0.216*** (0.029)	0.254*** (0.020)	0.175*** (0.021)	0.215*** (0.022)	0.166*** (0.027)	0.208*** (0.021)
企业 所有制	0.425*** (0.052)	0.446*** (0.061)	0.387*** (0.055)	0.355*** (0.053)	0.341*** (0.048)	0.363*** (0.051)	0.312*** (0.050)	0.301*** (0.052)
代理 变量 PS1					0.217*** (0.012)	0.216*** (0.011)	0.217*** (0.011)	0.215*** (0.013)
代理 变量 PS2					0.196*** (0.010)	0.201*** (0.014)	0.194*** (0.011)	0.200*** (0.012)
常数项	0.652	0.483***	0.587	0.394	0.556	0.637***	0.272	0.495
样本数	2308				2308			
Pseudo R ²	0.126				0.331			

注：在户籍变量中，“本地城镇户口”为参照组；在受教育程度变量中，“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故未显示结果。* $P<0.1$ ，** $P<0.05$ ，*** $P<0.01$

表 5 城镇户口工人与农民工劳动权益户籍差异的 Blinder-Oaxaca 分解

	工资收入	劳动合同	社会保险			
			养老	医疗	失业	工伤
总体差异	0.413 (100%)	0.386 (100%)	0.427 (100%)	0.448 (100%)	0.463 (100%)	0.504 (100%)
已解释部分	0.297 (71.9%)	0.261 (67.6%)	0.242 (56.7%)	0.271 (60.5%)	0.237 (51.2%)	0.256 (50.8%)
未解释部分	0.116 (28.1%)	0.125 (32.4%)	0.185 (43.3%)	0.177 (39.5%)	0.226 (48.8%)	0.248 (49.2%)

注：括号外的数字是系数，括号内的数字是百分比

表6 本地城镇户口工人与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劳动权益户籍差异的Blinder-Oaxaca分解

	工资收入	劳动合同	社会保险			
			养老	医疗	失业	工伤
总体差异	0.253 (100%)	0.214 (100%)	0.239 (100%)	0.246 (100%)	0.275 (100%)	0.203 (100%)
已解释部分	0.136 (53.8%)	0.132 (61.7%)	0.126 (52.7%)	0.141 (57.3%)	0.151 (54.9%)	0.115 (56.7%)
未解释部分	0.117 (46.2%)	0.082 (38.3%)	0.113 (47.3%)	0.105 (42.7%)	0.124 (45.1%)	0.088 (43.3%)

注：括号外的数字是系数，括号内的数字是百分比

口性质所造成的差异达到28%。

其次，有研究认为，城乡工人在劳动合同的参与中不存在户籍歧视。^[5]然而，表5中的分解结果显示，两类工人的总差异达到38.6%。其中，由户籍歧视造成的差异为32.4%。

最后，在四类社会保险参与中，城乡工人的总差异分别为42.7%、44.8%、46.3%和50.4%。其中，由户口性质所引发的差别分别为43.3%、39.5%、48.8%和49.2%。这一结果反映出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中受到了明显的区别对待。

2. 户口所在地对工人劳动权益的净影响

前已述及，已有研究忽略了户口所在地对工人劳动权益的影响，甚至有研究者认为，城镇户口工人的劳动权益不存在户籍歧视。但是，表6的分解结果却反映出，户口所在地对劳动权益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在劳动权益的某些方面，户口所在地的影响要高于户口性质的影响。具体而言，与本地城镇户口工人相比，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在劳动权益的诸方面受到的区别对待如下：

首先，在工资收入方面，城镇户口工人的总差异为25.3%。其中，可以由户口所在地解释的差异达到46.2%。这一比例高于上述由户口性质导致的收入差异近20个百分点，它有力地反映出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在工资收入上确实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户籍歧视。

其次，城镇户口工人劳动合同的总差异为21.4%，有38.3%的差异可以由户口所在地解释。这一结果同样高于上述可以由户口性质解释的劳动合同差异。

最后，就四类社会保险参与的情况来看，城镇户口工人的总差异分别为23.9%、24.6%、27.5%和20.3%。其中，可以由户口所在地解释的差异分别为47.3%、42.7%、45.1%和43.3%。其中，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方面，由户口所在地解释的差异要高于上述由户口性质解释的差异。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已有研究的未尽议题出发，采用新的研究设计，按照户籍制度的双重属性，即户口性质和户口所在地，构建出含有三个类别的户籍身份变量，并通过“同质性”的样本选择和代理变量的引入，尽可能消除由于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估计偏差，从而获得了一些新的研究结论。

首先，针对户口性质影响的考察增加了已有研究中鲜有论及的内容，得出了一些与已有研究不同的结论。一方面，已有研究在考察社会保险参与差异时往往只聚焦于养老、医疗和失业三类保险，本文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工伤保险，并发现城镇户口工人参与工伤保险的概率比农民工高出49.2%；另一方面，有些研究者认为城乡工人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中不存在户籍差异。本文的研究发现，两类工人在劳动合同签订中，可以由户口性质解释的差异高达32.4%。之所以出现与已有研究不同的结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样本比例不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加入了工伤保险的缘故。

其次，户口所在地对工人诸方面劳动权益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本地城镇户口工人和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劳动权益的比较，本文发现，相对于本地城镇户口工人，外地城镇户口工人在工资收入、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均处于较为明显的劣势。这一结论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不但存在着由户口性质导致的城乡分割，同样存在着由户口所在地造成的“内外分割”，这种“内外分割”充分体现了本地城镇户口的附带价值。

再次，户口性质和户口所在地对工人的劳动权益均有明显影响的事实说明，户籍制度具有“双轨效应”，

即户籍制度既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职业发展和待遇提高,同时也限制了城市人口的流动、职业发展和待遇提高。

最后,在户口性质和户口所在地的回归模型中,代理变量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前所述,代理变量即个体突破户籍限制获得本地城镇户口的倾向性得分。倾向性得分越高,意味着个体的“能力”越强。本文的研究发现,倾向性得分越低的个体,受到的户籍限制越强。这说明户籍制约的往往是“能力”较弱的人。这种情况一旦持续存在,有可能形成“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市场中不公正的户籍分层。

早在2012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就在农民落户的层级上放开了设区的市(不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并规定就业等政策措施,不与户口性质挂钩。本文基于长株潭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于中央这项户籍改革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城乡工人的劳动权益仍然存在较大的户籍差异。这种户籍差异不仅是由户口类别造成的,户口所在地的影响同样显著。因此,未来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但需要取消二元户口类别的划分,还需要将户籍制度改革与整个经济体制转型连接起来,剥离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各种黏附于本地户口之上的权益和福利分配机制,降低户口的含金量。同时,需要逐步建立其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社会保险参与中

的地方保护主义,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平等享有各类社会保险的权利。

参考文献:

- [1] 李强.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6-38.
- [2] Xin Meng, Junsen Zhang. 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3): 485-504.
- [3] 王美艳. 转轨时期的工资差异: 歧视的计量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研究*, 2003(5): 94-98.
- [4] 李培林, 李炜.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J]. *社会学研究*, 2007(3): 1-17.
- [5] 姚先国, 赖普清. 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J]. *经济研究*, 2004(7): 82-90.
- [6] 陆益龙. 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1): 149-162.
- [7] Wu Xiaogang, Treiman Donal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 [J]. *Demography*, 2004(2): 363-384.
- [8] Nielsen H. Discrimination and detailed decomposition in a logit model [J]. *Economics Letters*, 1998(3): 115-120.
- [9] 黄志岭. 社会保险参与的城乡工人户籍差异实证研究[J]. *财经论丛*, 2012(4): 34-40.
- [10] 姚先国, 黄志岭. 人力资本与户籍歧视——基于浙江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的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6): 57-64.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fferentials of urban-rural workers' labor rights in China

LI Xiaof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rural workers in Chinese labor market has always been a heated issue in the academi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ang-Zhu-Tan City Group” in 2015 and adopting relevant econometric model, the present essay introduces two proxy variables which represent unobservable elements,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dual attribute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at are the type of registration and place of registration on labor rights. The findings of this empirical study demonstrate that without the influence of proxy variables, the dual attributes both have remarkable impacts on labor rights. Compared with urban registered workers, rural registered workers have many disadvantages in various aspects of labor rights, while ecdemic urban registered workers, compared with local urban registered workers, are also at their disadvantage. Therefor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in the future will need to bridge not only the division of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in labor market, but also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local and ecdemic.

Key Words: registration differentials; labor right; urban labor; rural labor; division of local and ecdemic

[编辑: 胡兴华]